

几十年前的南通农村合作医疗制度

□程太和

“赤脚医生向阳花，贫下中农人人夸”“合作医疗就是好，农民看病花钱少”——这是当年农村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地区实行合作医疗制度，这是一种互助性质的医疗形式，即由社员和集体筹集一定资金，社员看病的药费由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，基层医疗人员的报酬采取记工分的方式解决，由此搭建起了基层医疗网络。

以笔者所在的海安县为例，每个大队(村)设卫生室，有赤脚医生看病；公社和区里有卫生院，县城有医院。但那时基层卫生院也有水平较高的医生，他们是根据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指示，被分配到基层工作的。一般情况下，老百姓生病了首先到赤脚医生处看病拿药，如果自己比较重视或者发现病情比较严重，就上公社卫生院或区卫生院。公社或区卫生院的医生那时也主要用视、触、叩、听等物理诊断方法判断疾病。看不了的病，再到县城医院就诊。若是患了重大疾病，那就到地区医院或南通的大医院再确诊一下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，海安县城西郊还有一家部队医院，全称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四四医院”，这座医院知名度很高，海安及周边地区的百姓也有一二四四医院就诊的。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县级医院仅有X光机，但医疗费及住院费用也较为低廉。1972年2

月，笔者因患脑炎在丁所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，平均每天的住院费0.20元，共住5天，结算时计有住院费1元、医疗费10元多。出院后，通过大队合作医疗报销7元多，实际个人花了3元多。1974年夏天，笔者所在生产队有位徐姓农民患阑尾炎在公社卫生院做手术，用去医疗费30多元，大队合作医疗报销20多元，生产队又给了5元救济款，实际自己也花了几元。

据地方文史资料记载，1968年下半年，海安县在角斜公社、丁所公社进行合作医疗试点，同时在两个公社的所有大队建立卫生室。卫生室的医生来源，一是公社卫生院的下乡医生，二是临时招聘的赤脚医生。一般生产小队较多的大队，卫生室往往有3名医生，其中女性1名；有的大队还招用1名专门种植中草药、收购中药材的人员。农民在大队卫生室看病治病，收挂号费(门诊费)0.05元，不收药费；赤脚医生上门服务收诊费0.10元，不收药费；转公社卫生院治疗的病人药费，由大队合作医疗按规定比例报销。1969年2月，如皋县普遍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有社办、社队联办和队办三种形式。1970年上半年，如皋县885个大队全部实现合作医疗。1969年3月，海安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角斜公社召开合作医疗推广会议，要求全县各大队在4月底以前全部实现农村合作医疗。当年，海安县520

个大队个个办起了合作医疗，配备赤脚医生624名，大队(村)保健员500多名。其中，角斜公社配备赤脚医生16名，保健员12名；丁所公社配备赤脚医生15名，保健员11名；南屏公社配备赤脚医生18名，保健员15名；胡集公社配备赤脚医生12名，保健员10名；青萍公社配备赤脚医生14名，保健员12名；章郭公社配备赤脚医生14名，保健员12名。各公社除公社所在地大队外，其余各大队均建有卫生室，负责各大队的医疗防疫保健工作。一开始海安县的合作医疗经费由大队单独核算，后来过渡到社队联办，即大队上缴公社一部分资金，由公社在各大队间统一调剂。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，农村合作医疗在南通地区各县全面铺开，做法大致为每人每年筹集医疗费基金1.50—3.00元不等，其中个人缴纳0.15—1.50元左右，其余由生产队公益金解决，年终决算分配时由农村信用社一次性拨缴。

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，合作医疗可以说是尽力在解决农民看病难、看病贵的困境。

一些农村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也积极钻研业务，用各种办法为农民看病。海安县丁所公社卫生院发明的一种医用皮内注射剂，80年代被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，并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展览。有些公社卫生院还研究出了接骨散、治疗水肿偏方、治疗黄疸

肝炎偏方等方剂。公社卫生院在日常看病治病的基础上，还积极做好防疫保健、预防接种等工作。

1972年起，合作医疗统筹费用从队办逐步改为社队联办和社办。

1973年12月，南通市卫生局与农村工作局联合发出《关于整顿郊区合作医疗的意见》，要求坚持“有医有药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走勤俭办医的道路，建立、健全社队合作医疗管理组织，配全大队赤脚医生；加强合作医疗经费管理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，经费要有专人管理；建立健全账册，定期公布，严禁贪污挪用合作医疗经费。

1974年12月，市卫生局与农村工作局联合发出《关于我市郊区合作医疗情况和今冬明春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各社、队总结巩固发展合作医疗方面的经验和赤脚医生工作经验。当年，郊区东风公社在队办基础上，上升为社队联办合作医疗。

1976年起，南通地区各县基本上实现社队联办合作医疗，各公社相继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(简称“管管会”)。

1981年6月后，随着农村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，合作医疗制度发生变化。1983年，南通市郊区对赤脚医生专业技术水平作了一次全面考核，部分经考核成绩优秀者，被吸收到乡镇卫生院从事医疗或防疫保健工作。

历史人物

张謇家医潘志成

□丁德全

潘志成，曾用名潘淑贞(1908—1995)，生于如东县双甸镇书香门第，是张謇夫人吴道愔的侄媳。其父潘良基与任氏婚后生有三女一子。她是最小的姑娘。哥哥潘祝光，也是双甸镇的知名人士。

双甸镇从家坝举人刘复基，1885年和张謇同年同科中举，后来成为为至交。刘复基未能考中进士，在张謇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，1906年和任雨楼、姚昂轩、丛育才四人创办双甸小学，潘志成曾就读于这所学校。1910年刘复基又在家乡创办从家坝小学，张謇得知后，曾赠送条幅“高两迳四海，英名擅八区”。潘祝光带领双甸镇30多名知名人士送去黑底金字匾额，内容是“心梅(刘复基)先生：急公好义”，赞扬刘举人热心公益事业、乐于助人。

在双甸吴家庄有位开明绅士吴以恒，与蒋氏婚后生有二子二女。二姑娘小名叫吴素贞，后取名吴道愔(1873—1943)，因家贫，10岁时被送到离家20多公里的林梓镇大户沈绍元家做义女。1896年吴道愔与张謇结婚，1898年生下一子一独子张孝若。1926年张謇去世后，吴道愔成了张家主持内务的主管。由于家大业大而人手少，吴道愔想到娘家家人，就将弟弟吴兴能(珍儒)与刘氏婚后所生的三女三子(吴端荣、吴端华、吴端富、吴功勋、吴功伟、吴功俊)先后带到张謇家生活及工作。1930年前后，吴功勋与潘志成结婚。于是吴道愔也将潘志成带到张謇家一起生活。潘志成1932年生有一子，名叫吴名贻，10岁去世。后来丈夫吴功勋也于1936年去世，年仅27岁。

潘志成由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，有一定的文化基础，素养佳，于是吴道愔把潘志成介绍到南通名中医、妇科专家喜仰之(1895—1980)处学习，中西医学成后，当起了张家的保健医生。潘志成文化素养高，又有中医理论和实践知识，十分注重饮食调理平衡，变着花样制作健康菜肴。

潘志成为人谦和，说话轻言细语，待人彬彬有礼，喜欢抽烟、喝天水茶。她精通中医，把脉相当准确，张家人有病痛她都耐心仔细把脉、开方、用药，空闲时间还帮教识字。吴道愔1929年把10多岁的二侄儿吴功伟(1917—1998)带到张謇家，吴功伟识字不多，潘志成耐心教育他，逐步加深了感情。吴功勋去世后，经吴道愔介绍，潘志成又嫁给吴功伟，生有四子：吴名泉、吴名生、吴名才、吴名令(顾传新)。潘志成与吴功伟在张家结婚时热闹非凡。人们闹新房，把马桶盖子藏起来，逼着她去买了300斤糖果发给大家。夫妻俩婚后和睦恩爱，1932年吴功伟在颐生酒厂担任调酒师，酒料配方由他掌握。厂内挂有张謇1919年撰写的厂联：“有秫足供蒸馏醇，如荣能表洞庭春”，该厂1938年因日寇侵略停产。1940年8月吴功伟担任南通有斐宾馆经理等。1948年8月颐生酒厂恢复生产。他又入厂工作，后调入南通专卖公司及掘港酒厂。1962年因粮食紧张，酒厂缩小规模，吴功伟被调到如东岱南供销社当营业员，1963年5月回老家务农。

1948年3月9日，双甸镇解放，曾担任双北乡民兵大队长的吴功圣、村指导员吴功永，在南通开会后找到潘志成等人，劝说他们回老家。于是当年潘志成带领家人回到吴家庄，开设私人诊所。南京医药南通德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春回忆说：“潘先生开的诊所就在双北小学旁边，仅一墙之隔。面积20平方米左右，靠东墙朝西并排放着两张木药橱。面积虽不大，但收拾得特别干净整洁；潘先生医术精湛，为人文雅谦和，周围百姓生了病总喜欢找她诊治。那时西药较少，她替人治病常用中草药。记得有一次我头痛、鼻塞、发热，她摸了摸我的额头，看了我的舌苔，问了我哪儿不舒服，说我爱风寒了。随后她拿了一块生姜，用一小张白纸包好，浸湿了水，放到小火上烤。然后将外表烤得微焦的生姜切成片，交给我母亲。吩咐拿回去后，加葱白、红糖冲开水喝。我喝下后，发了一身汗，顿感舒服多了。那时，潘先生已能替人打针。当时的针筒是玻璃的，针头和针筒可反复使用。在使用前要消毒，潘先生将针筒针头先用开水洗净，然后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铝质盒子里，加水煮沸一定时间进行消毒。加热用的是一盏玻璃的酒精灯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加之还喜欢闻酒精的那个味道，所以常常饶有兴趣地到诊所看潘先生煮针筒。”

1956年公私合营后，诊所并入双北乡联合诊所，联合诊所就设在潘志成家前面那幢房中，在当地很有名气，有名医戴铁岩、牙科名医冯西雨、医生吴功云等。潘志成由于经常忙出着诊，家里孩子无人带，还请来亲戚当保姆。潘志成时常常给困难户免费治疗，有的还贴钱治疗，深得当地群众的好评。1958年10月人民公社成立后，潘志成在双甸医院当医生直至退休。她作为地方民主人士，曾担任第1—6届县人大代表，履行职责，直至“文革”。

地名掌故

南通四“港闸”

□黄浪

今年7月是南通市港闸区撤销四周年。2020年7月17日，南通行政区划出现重大调整：原崇川区、港闸区撤销，设立新的南通市崇川区；海门市撤销，设立南通市海门区。至此，南通市格局翻开新篇章，港闸区的设置也成为历史。

今天，当人们提起“港闸”这个地理概念时，通常将其与1991年至2020年设置的港闸区相提并论，其实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偏差，甚至南通历史上还存在另一个港闸区：1979年4月至1983年6月，南通城区分置为城中、港闸两个区，城中心即南通老城区，而这一阶段的港闸区和后来的港闸区地理范围差异很大，这是一个早期的港闸区仅有唐闸与天生港两地。唐闸镇区与天生港镇区并不接壤，所以此港闸区实际上分属两个区域。有趣的是，早期的港闸区被视为城区，而后来的港闸区被当作郊区。

从字面分析一下“港闸”这一地名，“港”为天生港，“闸”是唐闸，因此早期的港闸区设置与“港闸”地名更贴切。我们常以“百年港闸”形容港闸区，对其历史的追溯总会涉及清末民国时产业繁荣、交通便捷的唐闸与天生港。从中也可见“港闸”源于这两个大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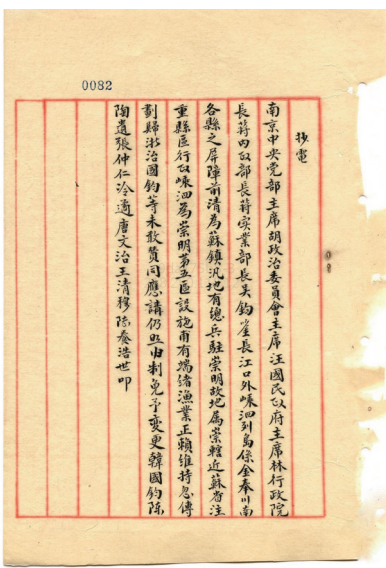
南通还有第三个带“港闸”的名称，即设于1959年至1966年间的港闸人民公社。这个港闸人民公社即南通民众熟悉的闸西乡，“文革”期间又名胜利人民公社。港闸人民公社的镇区位于唐闸与天生港中间位置。唐闸与天生港之间有南通史上第一条公路港闸公路，连接两镇的河流也叫港闸河(又名天生港河)。那么，基于上述原因而把闸西命名为“港闸”合理吗？其实类似情况在南通很常见：南通老城区与五山间的路线称作城山路，中间有城山社区；城区和天生港之间路线为城港路，中间有城港社区、城港新村；城区与唐闸间又有城闸路，中间也有城闸大桥。可见，以两地合称命名两地之间的重要点位是司空见惯之事。

以上三个“港闸”均为历史上设置过的区级或乡镇(公社)级的行政区划单位。在2020年7月港闸区撤销后，还存不存在行政区划意义的“港闸”了呢？当然存在，这便是南通第四个“港闸”——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，其辖区相当于永兴街道与天生港镇街道。这种情况在江苏其他城市也存在，如南京撤销了白下区，但仍有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；扬州维扬区被合并，但“维扬”之名保留于“维扬经济开发区”之中。不过，虽然现今官方地名中的“港闸”仅为港闸经济开发区，人们却仍习惯把1991年至2020年设置的港闸区叫作“港闸”，有时称其为“老港闸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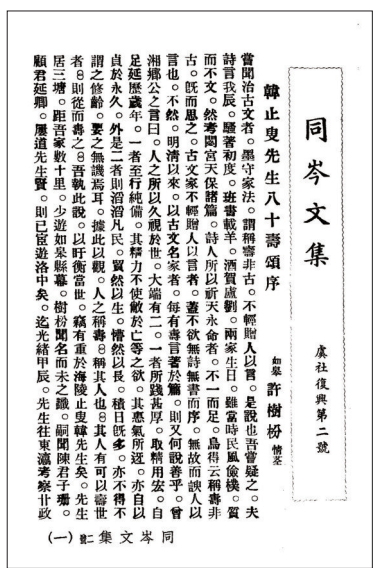
黄菊祗髻秋圃色，青松愿葆岁寒姿

韩国钧诗文唱和度八十寿辰

□夏俊山



左：《唐文治年谱长编》中提到的电报，右：许树枏《韩止叟先生八十寿颂序》



事，来给你贺寿是我的事。韩国钧也只能接待，但不收财物，只受诗文。高朋满座，韩国钧自己带头写下《八十感怀诗八律》。且举两首：

八十方称中寿期，罔陵庆祝亦奚为。已非鸿鹄冲天日，况是龙蛇起陆时。黄菊祗髻秋圃色，青松愿葆岁寒姿。平生妄作澄清想，大厦如何一木支。

湖海元龙意气豪，光阴逝水日滔滔。知希始信我为贵，老伏无如生太劳。偃鼠饮河徒满腹，解牛善技合藏刀。四方蹙蹙吾安卧，坐对东风首自搔。

著名教育家江谦(1876年—1942年)写下《恭读止公大德八十感怀八律歌以和之》(载宁波观宗寺《弘法刊》32期)，举一例：

公时七十谦贻诗，劝修净土娱期颐。忽忽十年更瞻拜，容颜八十愈丰滋。却老还童岂有术，谓非德润能谁之。忧国忧民岂不劳，崭新犹是庖丁刀。

书画家许树枏(1861—1941)也写下八首《和韩止叟八十述怀》(载常熟虞社《同岑诗集》二号)，也举一例：

宦海收帆庆古稀，十年南极又星辉。香山入画添新咏，玉树盈阶长旧围。放眼奇观矜绝代，赏心襟抱爱晴晖。铃鞍轡轡干官拜，哪及儿孙舞彩衣。

此外，许树枏还写了《韩止叟先生八十寿颂序》，称赞韩国钧：“由县令起家，历监司，跻封疆，位愈尊而心愈下，质愈重而形愈劳。不谄不黷，政成民和……”

关心时事 奉献余热

韩国钧八十大寿，江谦写诗劝韩国钧：“天犹归佛泛人群，毁佛陋儒徒自失。愿公旦暮礼弥陀，此是天无尤事。”韩国钧并没有听从劝告一心向佛。他仍然关心时事，不忘奉献。

据郭振民《峡西渔业史话》，江浙两省之间为峡西列岛的归属和治辖权曾发生过一场持久的争论。主要有“维持苏治”“划归浙治”“划为中央直辖之海上特区”等不同主张。1936年，浙江省政府据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赵次胜及旅外同乡会等呈请，咨江苏省政府，主将原属江苏省峡西各岛，划归浙江省定海县管辖。

赵次胜等列出五条理由：一，位置，峡山海岛现属江苏崇明县，然其距离颇远……航行不便，交通阻滞。故凡峡民

近代仅一位，就是被誉为“一代水圣”的李仪祉。韩国钧关心水利事业，也曾为治理水患奔走多年，此行顺理成章。同行的人都约好了，遗憾的是因舌病未能成行。去了陕西，他就去了海安的友人李昂初家。据《永忆录》记载：“余八十寿时，在李君最(昂)初家，与二三友人聚谈，终日自适，赠物一概谢绝。”

一年后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日寇南下，海安沦陷。据《追忆避寇乡间的韩紫石先生》(李炳的口述，李存铭整理)：“当蒙老避日寇于徐庄，经其契友李昂初先生介绍，曾寓居小舍，以尽后节于徐庄。”(见1985年《海安文史资料》第1辑)。韩国钧80岁时到李昂初家小住的这段友谊佳话，后来竟结出了避难徐庄、至死不屈，成为“民族抗日之楷模”(陈毅语)的善果。

感情却却 诗文唱和

请吃喜酒赖吃面，意思是没有受到邀请是不参加喝喜酒的；贺寿不要邀请，应该主动前去。这不仅是海安一带的民俗，别的地区也有。韩国钧再避，还是有很多人请自来——办不办寿宴是你的

韩国钧(1857年3月29日—1942年1月23日)，江苏省扬州府泰州海安镇(今江苏海安)人。民国北洋政府时期，韩国钧曾任江苏省民政长、安徽省巡按使、江苏省省长等要职。

韩国钧从政数十年，故旧门生遍天下，1936年，他迎来八十大寿，大操大办一下，广受寿礼，未尝不可。他是怎样过这个生日的呢？有几点值得一记。

选择出行，谢绝贺寿

韩国钧《永忆录》记载：“我二十五年来，余既谢绝八十称寿，拟参观陕西李仪祉先生经营之八道渠，约程君寿卿为秦中之行，首途有日矣，因舌病未果。仪祉先生以利专家又熟于历史，思规复汉唐繁盛之旧，各渠告成，固增加秦中之农产，亦减少黄水之来源，兴利除害莫善于此。”(见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《永忆录校注》101页)。

为了回避各地的同僚、友人、门生等前来祝寿，韩国钧选择远行，准备参观陕西李仪祉先生经营的八道渠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官网公布了12位“历史治水名人”，大禹、李冰等古人占了11位，

厕屋六间、堂内体操场一方”。学堂分为两个学制，即“速成科”“本科”两科：前者一年半即毕业，后者有甲乙丙丁四班，四年毕业。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二月开学，在此前的第一学年中，只开设了速成科，共二十七名学员。该校不乏名师，堂长沙元炳为“甲午科翰林院编修，如皋师范监督”；张藩为“丁酉科拔贡，内閣中书，师范学堂董事兼助理本堂庶务”；庶务员葛云鸾为“癸卯科举人，江宁府学光绪二十九年修业生”，负责学堂前期原试院改建等事宜；主管学校庶务兼管理艺科事宜；文科管理任为霖，“如皋附生，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毕业”。

课程的排布分上下学期，其中速成科上学期有“修身、读文、作文、算术、习字、体操”六大课程，在下学期，“读文、作文”课程取消，增设了“艺科织工”的职业课程。其中文化课程所用教科书均为商务馆编印的初等(小学)教科书，而职业课程“艺科织工”包括编织柳条角巾、斗纹布、翻棉布、毛巾、东洋铁机大布、珠罗布等。

学堂收支平衡，时年岁入3582元，岁出共3438元。沙元炳、张藩二人均“义务支薪薪水”，所以费用包括其余人工资945元、服食品476元、学校基建507元、图书标本(包含图书、教具、教学消耗、实验等)615元以及其他一些杂

费。学堂资产总额约12000多元，堂舍及基地占有大头，有7750元，其中“除试院旧有屋料不计外，建筑项下添置新砖瓦、木料、石灰等件”；而场所及设置约值881元，图书标本约值34元；原来试院的民田15亩约值150元，圩田62亩约值150元；普济堂分拨的圩田706亩约值2260元，并在此备注此田靠近江坝区；而捐赠的田地及店房共计842元。

对比各项收支，可见该校等于施行“义务教育”，办不了学生的学费及衣食住行。收入一项中，大多数都备注了“无定”二字，而学校本身的“造血”功能相对开支只是杯水车薪，可见如果没有沙元炳等乡贤的大力资助与奔波，学校无法创办、经营。

清末如皋的新式学堂经费从何而来

□沈华枢